

支持梁振英是應有之義

有話要說 大衛

本沒有任何意義，也不可能為他們爭取到更多的選票支持。

更重要一點在於，為什麼梁振英沒有被「罵倒」？中央的支持固然是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還在於，就目前而言，沒有人能比他更有能力、更有效去應對香港複雜的政治形勢。在「佔中」狂潮之下，在「旺角暴亂」的嚴重違法情況之下，在「港獨」與「極端本土」暴虐之下，在香港法治與憲制秩序受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他秉持遵循「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原則基礎，沉着應對，數次將香港從危機邊緣中扭轉過來。而四年來他本着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提振經濟，遏制過熱的樓市，促進就業，開拓年輕人的發展空間，開拓香港整體的競爭力，等等，這些都得到市民的認可。換言之，市民支持梁振英，是因為他的施政符合市民的根本利益。

支持梁振英完全是應有之義，這與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無關。只要他仍是香港的特首，市民支持他依法施政，實際上是在支持市民自身的利益。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反對派極力反對梁振英，正正是因為反對派過去的那套撕裂社會、挑撥兩地關係、吸取境外政治勢力金援等做法，難以繼續進行下去。如果梁振英不再是特首，一個可以肯定會出現的事實是，反對派的勢力必將進一步坐大，而「港獨」等嚴重違反「一國兩制」的惡行，也必將捲土重來，這是涉及香港安危的大是大非問題，含糊不得，務實的香港市民豈會看不清？

所以，反對派的「倒梁」不僅沒意義，更不可能取得任何實效。如果反對派還能有起碼的政治判斷力，就應該從更務實的角度去爭取市民支持，否則，越是「倒梁」也就越是「倒米」矣。

炒作「倒梁」無意義

反對派這麼「罵」，無非是為了解騙取選票的目的。但這種做法根本於事無補。且不說在過去四年來反對派從沒有一天停止過「罵梁」，但梁振英依然沒有被「罵」倒，僅以眼下的政治現實而言，不論社會不會競選連任，任期之內都不可能會提前結束。梁振英在任一天，他就是香港特區的政治長官，這是反對派不能改變的事實。所以說，「泛民」的這種「倒梁」炒作，根

「泛民」反釋法實是撐「港獨」

議論風生

陳光南

反對派繼續對抗人大常委會釋法、高等法院和上訴庭的判決，繼續宣稱宣誓問題「是立法會的內部事務」，「選民選舉的議員不容剝奪資格」，提出了所謂特區政府提出司法覆核就是「行政企圖控制立法會」，「企圖改變選舉的結果」，並且大肆宣傳了「政府迫害反對派」的謬論。

這些說法既違反了事實，也違反了香港的法治精神。剝奪「港獨」分子的議席，根本原因是清楚的，他們蓄意拒絕或者迴避按照基本法一零四條宣誓就職，堅持分裂國家領土的立場，所以按照香港的憲制，未能依法宣誓的任何候任議員，都不能成為立法會議員。這絕對不是「政治迫害」，而是違憲違法受到法律制裁的結果。

為「二次佔領」造輿論

反對派的所謂「大狀」，平日高叫維護香港法治，對「港獨」違法宣誓問題，他們就完全反對「法治」了，絕口不提基本法一零四條，更絕口不提「宣誓和聲明條例」二十一條，更加公開對抗上訴庭和高等法院的判決。「迫害論」留有一條煽動香港青年上街暴亂的尾巴，為他們的「第二次佔領」製造輿論。

反對派的動向是非常危險的，他們一方面拒絕了中央政府溝通對話的善意，一方面又再鼓吹對抗，否定香港的憲制和法庭的判決，蠢蠢欲動，企圖製造大規模的對抗，廣大市民必須小心謹慎看待反對派的「升級行動」。

反對派庇護和支持「港獨」分子留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權力機構之內，並且宣稱是立法會的內部事務，企圖將立法會變成「獨立王國」，變成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管轄的化外之地，其實就是隱性「港獨」的一個策略。一段期間以來，建制內都有人做了「東郭先生」，容許反對派在宣誓的問題上，挑戰基本法，並且宣稱「立法會主席無權剝奪經過選舉產生的議員」，這樣就造成了反對派氣焰越來越高，逐步升級，終於到達了侮辱國家、侮辱基本法、拒絕和逃避宣誓效忠的惡劣程度。

法院宣布基本法一零四條有效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判決的意義是很明顯的，「港獨」分子如果企圖引用零四年、零八年、一二年立法會宣誓違反基本法又獲得立法會主席認可的例子，作為辯護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基本法的第一條就講清楚了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第十二條講清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一百五十九條說明了基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既定方針政策相抵觸，這說明了任何人企圖煽動群眾修改基本法，搞什麼「自決」，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是行不通的。人大常委會的釋法並沒有增加任何基本法的內容，而是要求香港的各個部門，嚴格把關，落實基本法。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的第二款，授權行政長官執行基本法，依照基本法也適用於香港的其他法律。反對派一直以有關條款是「冇牙老虎」，行政長官通過這次宣誓問題的法覆核，具體地體現了基本法這個條款的巨大威力，這是香港建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今後，任何公職人員，包括立法會主席，如果疏忽或者故意不執行基本法，行政長官都會有權提出司法覆核，由法院糾正錯誤。任何人不執行基本法，挑戰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不是言論自由

的問題，更不是立法會內部的事務的問題，一定會由行政長官提出司法覆核。

反對派早前還推出「三權分立」的怪論，為「港獨」分子辯護，完全是缺乏憲法學常識的。第一，任何公職人員所獲得的權力，都是由憲法制度所授予的，所以宣誓一定要盡忠誠、莊嚴、全面、準確。第二，「三權分立論」是偽命題，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是實行「三權分立」的制度，香港僅是一個地方政權，不擁有任何主權，不是國家級的議會。香港立法會僅是一個地方的立法機關，上面還有中央政府、基本法，負責執行基本法的行政長官，只有人大擁有最高權力，所以香港的立法會、司法機關、行政機關要受人大釋法的約束。

中央已釋放善意

人大常委會釋法後，香港高等法院和上訴庭的判決，是法治的具體體現，是香港憲制運作的必然機制。留在權力機構範圍內的立法會議員，一定要遵守法律，遵守憲制，以行動表示他們是遵守和擁護基本法的。以前他們可以說是清楚犯法的界線在哪裏，現在清楚了，他們就應該有所收斂，有所更正，否則，他們就只能夠成為建制之外的反對派。

現在是一個冷靜期，中央政府已釋放善意，想辦法給反對派一個下台階的機會，提出加強溝通。如果反對派不願意下台階，反而提出「迫害論」，就很低智。因為這是法院的判決，法院不會考慮什麼立法會議席的問題，若什麼人違反了法律，法院就會依法處理。反對派提出反智的言論，頭腦發昏，就只能走上一條死胡同，他們的政治智慧，相信好不過胡言亂語的「港獨小學雞」。

資深評論員

高院法官自覺維護基本法權威意義重大



學者論衡

田飛龍

一致性，體現了香港精英層的理性共識。即便是從一己利益出發，我們也需要對香港精英的這種理性選擇加以肯定。

香港司法的新法理學

與反對派內部的糾偏相比，香港司法也正在發生一次悄然的法理學轉型，這種轉型是由人大主動釋法倒逼出來的。十一月三十日，高等法院上訴庭作出上訴判決，更加清晰明確地承認和適用了人大釋法內容，並確認了釋法的追溯力和普遍約束力，為同類案件之適用埋下伏筆。在梁游案告一段落之際，律政司正式啟動對劉小麗宣誓行為的司法覆核，預期議席懸空可能性較大。

回歸以來，基本法秩序內亦存在兩種法理學：其一是中央以立法者身份跟進闡釋和守護的國家主義基本法法理學，這種法理學見諸於小平論述、立法資料、護法學者著述、人大釋法／決定以及較為系統化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但總體上不夠系統成熟，也未達到香港法治社會所理解的法理學權威性、體系性與可接受性；其二是香港法律界與司法系統按照普通法方式發展出來的逐條和逐案的本地主義法理學，將香港的普通法身份與其政治上主權歸屬身份加以區隔，營造一種法律意義上的地區獨立身份。這兩種法理學時有衝突和交鋒。

回歸十九年來，中央管治權與香港司法的法理學博弈有這樣一個規律：中央消極放任時，香港司法就會我行我素，很難顧及國家利益和基本法整體秩序；中央以非正式方式提示或警告時，香港司法之調整與回應十分有限；中央以基本法上的合法權力或解釋或決定時，香港司法則表現出較為正式的遵守立場。這表明，香港司法以其法理學的一般認知，較為傾向承認以合法形式宣示的中

央權威及規範指引，而不大接受非正式的指示或干預。此次人大主動釋法儘管遭遇各種議論，但在香港司法看來是合法而清晰的法理指引，是可以接受的法治形式的權威。中央若要理解香港司法及做好制度性互動，就要更多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善用基本法上的中央管治權，理性踐履依法治港的中央憲制性責任。

高院上訴庭在判決中開始修正其普通法法理學：其一，承認人大釋法的程式和形式屬於大陸法傳統，香港普通法無權亦不可隨意加以管轄和判斷，由此凸顯了香港普通法的大陸法前提和限定，也標誌着香港普通法只是香港法律體系之一部分，有別於純粹的普通法地區；其二，確認香港司法權來自基本法授予，而不是香港的人權法案條例，也不是普通法的一般原則，這就重新確立了基本法在香港法律體系中的至上性，肥彭及香港反對派意圖確立的「本地法律凌駕性」遭到否決；其三，上訴判決認可人大釋法及其釋法說明的追溯力原則，解釋與本文具有同等效力，從法律生效時具有約束力，但不影響先前判決，這意味着人大釋法對香港選舉秩序與宣誓秩序的規制，已成為具有基本法地位的有效規範，成為香港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同時約束香港所有管治機構和適用對象；其四，上訴判決確認了對人大釋法無管轄權的立場，並不反對人大釋法的適度常態化。由於中央管治權法治化行使與香港司法接受人大的法律性介入，香港基本法實施將逐步進入「中央管治權+自治三權」的新法治生成階段，為香港持續繁榮穩定和法治鞏固提供新的法理學基礎和憲制權力架構。

香港善治接力前行

傳統「泛民」的適度糾偏與回歸，以及香港法官群體的責任自覺，構成了自「佔中」與政改失敗以來，社會分裂下香港精英的新共識，即「一國兩制」是最優框架，基本法是權利前提，一切政治目標應當置於基本法軌道內以和平方式追求。這一共識亦符合中央依法治港總體立場及香港社會多數民意，是中央與香港精英反對派的交疊共識。中央近日決定重發「泛民」回鄉證，是積極釋放善意與回應和解需求。當然，青年本土派不大可能接受傳統「泛民」的回歸路線，反對派內部分裂會加劇，部分「泛民」可能脫

離傳統陣營而與激進派合流，香港政治總體上「三分天下」的格局不會改變，但激進本土派的政治空間和話語權將大大收縮。

然而，我們也必須清醒看到，被中央管治權、香港建制框架及「泛民」精英政治所排斥的青年本土派也會反彈造勢，以街頭運動升級化作為政治泄憤方式。當然，這就將香港政治博弈的主戰場及競爭屬性適當降溫和降級：從原初聚焦於「港獨」和未來主義制憲的憲制競爭，重新降格為治安秩序和政策正義層面的管治。由於香港社會的青年教育、傳媒生態、貧富分化、經濟下行及公共政策失當的總體情勢並未有結構性改觀，特首選戰又將點燃政治戰火和激發反對派造勢議題，此次精英共識下的政治降溫與回歸操作之實際效果可能較為有限，激進本土派的議題操作和社運抗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但無論如何，從傳統「泛民」的政治反擊戰以及香港法官群體的司法調適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香港仍有生機的城市理性及秩序自我調整淨化的實際能力。

在「後梁游時代」，香港政治演化與善治前景仍有較多嚴峻議題，需要凝聚基本法共識及理性政治意識而合力解決：其一，中央持續承擔依法治港的憲制責任，以合法合理的權力行使和資源支持，敦促香港管治機構積極承擔基本法秩序責任，促進融合兩制的共識型基本法法理學的成形成熟；其二，傳統「泛民」與中央達成決定性的政治和解，就政府政改及體制內達成議題進行無障礙的常態化溝通，以「民主普選」繼續擠壓「本土自決」的政治空間；其三，在青年教育和青年成長成才上取得制度性和政策性突破，以香港與國家共同的力量與資源，為香港青年提供觀念糾偏與融入式成長的空間和管道；其四，香港司法更加側重理解和轉化基本法及人大釋法中的國家法理與國家利益，更深刻完成香港普通法的國家法升級工程，成為基本法秩序更為權威和全面的護衛者；其五，議員補選與特首選舉在合乎人大釋法與基本法秩序前提下，盡量展現規範性與競爭性，增強建制框架的民主認受性；其六，政府政策上兼顧發展利益與民生福祉，更加全面地評估和檢討公共政策失誤與風險點，提升香港管治的政策正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專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基本法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佔中」，不是旺角暴亂，而是十月十二日梁游等「港獨」候任議員的「宣誓辱國」行為。「佔中」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追求真普選，對基本法與國際標準或有誤解，但並未真正逸出基本法秩序軌道。旺角暴亂是激進本土派的自我標榜和「獨立成軍」的試水行為，打破了傳統反對派的非暴力禁忌，但其中也包含了香港管治中的政策正義因素。宣誓辱國事件則不同，是通過民主選舉進入建制體制框架的青年本土派與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秩序的精神決裂和政治宣戰，是顛覆基本法的衝鋒號角。正是在基本法秩序遭遇最嚴重的精神危機之際，人大釋法主動承擔了遏制「港獨」、精神自衛的憲制性責任。

或許是基於共同的秩序危機感，香港精英層儘管依舊有批評釋法干預香港司法獨立及中央過分強硬的指責，但總體上開始理解和接受中央介入行為的正當性。我們要注意近期香港兩個精英群體的危機管理與反應：其一，傳統「泛民」，開始了反對派內部的政治糾偏和止損，重新樹立「民主回歸論」和體制內追求更普選的政治話語權及路線主導權；其二，法官群體，以香港高院原訟庭和上訴庭為代表，其在梁游案中的司法判決日益明晰地承認和依據人大釋法內容作出解釋和判斷，自覺維護香港基本法的秩序共識與權威。

彭定康反「港獨」的兩面

末代港督彭定康號稱是「最關心香港民主」的人士，這不是基於其對民主的特別信仰，也不是基於其對香港人的特別愛護，而是基於其所在英帝國的國家政治利益。香港現有「泛民」的政治基礎與理念格局，和肥彭的「末代耕耘」密切相關。肥彭也一直作為香港「泛民」的實質精神領袖而影響香港政治。陳方安生等在「港獨」泛濫、中央強硬出手的艱難時刻邀請肥彭訪港，其本意在於救火和止損，因為正在發生的「港獨」和中央干預都不符合其根本政治利益：其一，「港獨」在傳統「泛民」看來，非其不願也，實不能也，於是理性地退而求其次，追求基本法下的雙普選，而「港獨」越發蔓延，反對派的話語權就越快易手於青年本土派，普選目標也就更加虛無縹緲；其二，中央以「港獨」為理由進行合法干預並逐步建立健全中

